



早期视听文化： 中国现代文化产业的重要起源

韩 晗

摘要：由摄影技术、录音技术共同组成的视听技术一经发明便传入晚清中国，形成了中国的早期视听文化。早期视听文化不但搭建了现代视听技术与中国现代文化产业之间的桥梁，而且还开启了“技术—文化”的转化范式，强化了技术之于文化的作用，较大地提升了技术从业者的经济、社会地位，为日后中国现代文化产业的发展吸收了更多的参与主体。历史地看，早期视听文化证明了文化科技融合在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发展中的示范意义，使其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一部文化科技融合的历史。在中国现代文化产业诸门类中，早期视听文化是较早进入产业化的。发展现代文化产业，势必要重视视听文化的作用与地位。

关键词：早期视听文化；中国现代文化产业；晚清

中图分类号：G124;K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81X(2017)05-0111-07

学界公认，中国早期视听文化内容繁杂，以早期照相机、留声机为重要载体，为后来的电影、广播、唱片等中国现代文化产业要素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视听文化的兴起，是以视听技术的在华转移为前提的。

从人类文明历史的高度来看，视听技术当之无愧是第二次工业革命——1834年电力革命的产物，属于人类认识自我、改造世界的结晶。毕竟在摄影与录音技术发明之前，人类对于声音、图像并无保留的能力，视听技术是人类千百年来念兹在兹的共同梦想。19世纪末，人类历史上这两项伟大的发明横空出世，催生了视听文化。

晚清中国，由摄影、录音技术构成的视听技术借“西学东渐”之势入华，孕育了中国早期视听文化。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唱片还是摄影，这些视听文化的载体无一例外地也是西方世界的“新玩意”。它们在中国的出现几乎与世界其他地方同步。因此，与世界视听文化同时起步，是中国早期视听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

从视听文化的内涵来看，视听文化保留声音、图像的功能性是一方面，它所反映的文化与技术的二元关系是另一方面。视听技术对于早期视听文化的推动特别是中国现代文化产业的贡献居功至伟。早期视听文化之于中国现代文化产业的的关系，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学术课题。

本文所言早期视听文化，特指电影技术传入中国之前(1905年)因摄影、录音技术传入中国而形成并以照相机、留声机为载体的萌芽期现代视听文化，它虽然内容简单，但见证了视听技术在华转移的路径与范式，在深层次上反映了文化与科技的融合，意味着中国早期视听文化的产业化发生，可以被视作中国现代文化产业的重要起源。

就本选题所涉及的内容而言，张伟的《西风东渐：晚清民初上海艺文界》(2013)、史通文(Andreas Steen)的 *Zwischen Unterhaltung Und Revolution: Grammophone, Schallplatten Und*

Die Anfänge Der Musikindustrie in Shanghai, 1878-1937(2006)^①与郑苏的 *Cover for Claiming Diaspora: Music, Transnationalism, and Cultural Politics in Asian/Chinese America*(2010)提及了部分内容,但系统的研究仍比较缺乏;另一方面,在中国现代文化产业的发生、历史演变的研究逐渐成为学界热点,探究早期视听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化产业起源的关系,尤为迫切。

藉此,本文拟以早期视听文化为研究对象,试图探索其如何成为中国现代文化产业重要起源这一问题,并从历史与逻辑两个方面来论述:首先从基本史料出发,借助技术、资本与文化的关系这一宏大语境,以视听技术的在华传播与早期视听文化的在华发生为立足点,阐释其参与中国现代文化产业构建进程中的角色问题;其次,从早期视听文化在华的若干发展特征入手,探讨它与中国现代文化产业的关系,进而从历史与逻辑上论证早期视听文化谓之中国现代文化产业重要起源的合理性,并试图审理早期视听文化之于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发展的思考与启发。

一、视听技术的在华传播与中国早期视听文化的发生

研究视听文化,必须从摄影技术与录音技术的发明这个重要的基础入手,必须先有上述两种技术的在华传播,尔后才有早期视听文化。摄影技术与录音技术问世时间不过相差30余年。前者由法国摄影师路易·雅克·芒戴·达盖尔于1839年改良而成,后者则以美国发明家爱迪生于1877年发明留声机为标志。在19世纪科技史和人类文化史上,这两大发明都占有颇为重要的地位。从理论上讲,两者皆属于“视觉技术化”与“听觉技术化”的范畴。19世纪,人类发明了电力,并且在化学、物理学、生物学、几何学等领域都有了质的理论突破。处于工业革命与全球化浪潮下的人类,已经不满足于用肉眼、耳朵与记忆以及书画描摹来保留所看、所听之物。摄影、录音技术的发明,是西方实验科学的巨大成果,也是现代科学与艺术相结合的第一步。尤其是摄影技术,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画家们的存在意义,德国哲学家瓦尔特·本雅明因而称摄影技术为“对上帝的亵渎”。

有趣的是,这两大发明的时间恰是早期全球化时代,中国当时正处于“西学东渐”的浪潮之下,因此它们与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产物(如蒸汽机车、轮船与现代枪炮)不同,作为第二次工业革命产物的它们与一同问世的电话、汽车一道,在问世不久便传入中国,成了晚清中国的“西洋镜”。

摄影、录音技术传播力度极大,它们借助全球化的动力,向世界各地迅速发散开来,形成了全球性的影响。就在摄影技术发明的同年12月,英国殖民地印度的《孟买时报》曾将这一发明予以报道,次年照相机便登陆当地并被用于举办摄影展。而留声机问世之后20年,便迅速与文化产业发生联系,世界上第一家唱片公司百代(Pathe-Feres)在1897年诞生,十年之后,留声机传入中国上海。

摄影技术传入中国,首选广东,这与广东地区经年累月的开放不无关系。据历史记载,早在1839年,澳门的《广东周报》便转载了《纽约美国人》的一封读者来信,称这位读者参观了达盖尔在法国的摄影实验室——该年8月,摄影技术才刚刚在这家实验室里问世;1844年,广东人邹伯奇设计制作了一套简陋的摄影设备,并写了《格术补》与《摄影之器记》两部书,此时距离摄影技术诞生尚不足五年^②;就在这一年,两广总督耆英将法国摄影师艾基尔为自己拍摄的照片赠送给四位外国使节;1846年,广州街头开始有在华外侨提供的摄影服务,一位名叫周寿昌^③的中国知识分子写道:

一为画小照法:坐人平台上,东面置一镜,术人自日光中取影,和药少许,涂四周,用镜嵌之,不令泄气。有顷,须眉衣服毕见,神情酷肖,善画者不如。镜不破,影可长留也。取影必辰巳时,必天晴有日。^④

① 该著已由吕澍在2015年翻译为中文并出版,书名为《在娱乐与革命之间:留声机、唱片和上海的音乐工业的初期》。

② 学界有观点认为,邹伯奇并未接受西方摄影技术的影响,而是受西方科学特别是化学、物理学等领域启发,独立发明摄影设备。笔者认为,此为一说,故辑录在此。目前史学界并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邹伯奇与西方摄影技术之间的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邹伯奇没有接触西方摄影技术的可能。

③ 周寿昌1845年获得进士名銜,曾在同治年间任詹事府詹事,光绪年间任户部左侍郎。

④ 周寿昌,《广东杂叙》//思益堂日札,北京:中华书局,1987:198。

学界一般认为，这是摄影技术真正传入中国的第一份证明性史料文献，即关于早期“达盖尔摄影法”的介绍，它又名银版摄影法，是当时西方世界最前沿的显像技术，由此可见摄影在中国的发展水平。在此之后，卡罗摄影法与湿版摄影法相继在英国伦敦被发明，取代了刚发明不久的达盖尔摄影法，而后两种摄影法分别在19世纪60年代传入中国。

摄影技术甫一传入中国，便显示出它与文化产业相融合的特性，可以看作是视听文化的早期萌芽，只是彼时只有“视”尚无“听”。摄影技术在广州、香港一经登陆，便在经济更为发达、市场更为健全的新兴都市上海获得迅速发展^①。1852年，法国人李阁郎(Louis Legrand)在上海创办的“公泰号照相馆”是中国第一家照相馆，当时的学者王韬曾撰文以记之：“(李阁郎)善照影，每人需五金，顷刻可成”^②，在李阁郎的启发下，广东籍摄影师罗元祐(曾任上海道台吴建彰的会计)不久后在上海开了一家影楼，其技术“胜于法人李阁郎多矣”^③，成了中国现代文化产业的先驱。在此之后，摄影技术与开埠而形成的商业市场相结合，意味着早期视听文化的出现，并使其走向了产业化之路。摄影技术促使视听文化的早期萌芽并使其走向产业化，但这里的“视听文化”并不全面，其中录音技术是缺席的。

摄影技术传入中国20余年之后，录音技术才转移入华。1877年爱迪生发明锡箔筒录音技术，不但效率低，而且有杂音。1889年，爱迪生借鉴贝尔(A. G. Bell)等人的经验，对技术予以改良，用蜡筒取代锡箔筒，并将改良后的新发明亮相该年的巴黎博览会，一时在欧美畅销。

就在爱迪生发明录音技术第二年的1878年，光绪皇帝下谕“以候补三四品京堂军机章京陈兰彬、三品衔同知容闳充出使美国，日国(西班牙)、秘国(秘鲁)钦差大臣”^④，在使美期间，陈兰彬看到了留声机设备，并做了记录：

又言英国已有人做藏话箱，数人分隔说话，对之书万里之远、百十年之久，揭封侧听，口吻宛然于立约遗嘱，诸大端尤为有用，将来制作尽善，当必传布中华。^⑤

陈兰彬或许弄不清爱迪生是英国人还是美国人，但这显然是中国人第一次接触录音技术的文献记录，陈兰彬已经预料到它将“传布中华”的大趋势。只是在没有互联网与飞机的时代里，录音技术在中国的转移，确实是一个令人惊讶的奇迹。1890年春天，英国人傅兰雅编辑的《格致汇编》第五年第一卷的“格物杂说”栏目中有一篇名为《新创记声器》，用了数千字的笔墨，详述了录音技术在中国的转移、传播，兹节录如下：

数年前，西人创有传声器即德律风(Telephone，引者注)，能远近通言，已属巧而又奇矣。今又有人造成记声器，能记存言语，数发其声，是奇而又奇矣。创此器者，美国人名爱第森(Edison，引者注)也。初设此器时，法虽奇巧，而不甚灵便，只为游戏玩物耳……观此厂内另有数种奇物，一种为蜡面小人，胸内藏记声器，已将言语存于其内，将小摇柄摇之……现美英法等国用此等器不少，日本国近年亦有之。去年上海丰泰洋行有此机器一副，以备购者观看其器。^⑥

这篇文献与周寿昌的《广州杂叙》均为视听技术对华转移的重要史料。由是可知，无论是摄影技术还是录音技术，传入中国的时间与其在西方被发明之时几乎相差无几，可以说是技术刚一问世便来到了中国。这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被卷入全球化所导致的结果，也见证了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科学技术的全球化迅速转移。

留声机传入中国之后，“丰泰洋行”是其代理商，陈列有样品“以备购者观看其器”，但这只是一次尝试，并未完全打开中国的市场。几年后的1897年，留声机在中国终于有了颇为稳定的市场规模——英商谋得利洋行(Moutrie Co.)在上海为留声机打开了销售市场。

① 张伟. 西风东渐：晚清民初上海艺文界. 台北：秀威资讯，2013：299.

② 王韬. 王韬日记. 北京：中华书局，1987：192.

③ 王韬. 王韬日记. 北京：中华书局，1987：193.

④ 清通鉴·同治朝、光绪朝、宣统朝(4). 长沙：岳麓书社，2000：333.

⑤ 陈兰彬. 使美记略//上海中山学社. 近代中国·第十七辑.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371.

⑥ 佚名. 新创记声器图说//傅兰雅. 格致汇编. 南京：凤凰出版社，2016.

谋得利洋行是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中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它在创立之初以销售西方乐器闻名沪上,尔后又设立戏院,售卖留声机,在天津等地开设分号,被看做是开启中国“摩登时代”的重要推手。谋得利雇佣谙熟中国民风世情的掌柜,为之宣传作势,称留声机为“唱戏机器”,一时冠绝于沪上。因此,它所代理的留声机竟不愁销路,该洋行也很快成为十里洋场留声机的第一代理商。

摄影技术与录音技术相继进入中国之后,凭借着在华外侨、新派知识分子与大量市民阶层的推动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形成了中国的早期视听文化,并迅速产业化发展。1905年,摄影技术的“升级版”——电影技术被引入中国;1928年,录音技术与摄影技术的合体——有声电影在美国出现,两年之后的1930年,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歌女红牡丹》问世。这部由明星电影公司投资、洪深编剧、张石川导演的电影,成了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的经典之作。

任何一种文化产业体系的形成,必须具备技术、市场与文化三要素,缺一不可^①。通过上文叙述可知,现代视听技术在华转移之后,迅速生根发芽、枝繁叶茂,形成了早期视听文化。它借助中国现代文化产业萌芽并发展的大势,在租界开埠、都市兴起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浪潮中,与同时代的新兴文化一道,参与到构建中国现代文化产业这一大势中,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早期视听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化产业之关系

正如前文所述,在技术、文化与资本的合力作用下,早期视听文化一经在中国形成,便迅速在产业化之路上驰骋,下文拟结合早期视听文化在华的发展特征,来梳理早期视听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化产业之关系。

首先,从发展轨迹上来看,早期视听文化前承视听技术,后启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在视听技术与中国现代文化产业之间搭建了一座重要的桥梁。

欲形成视听文化,视听技术势必先行。19、20世纪之交,录音技术刚一传入中国,便有人靠售卖留声机获利,或是将留声机作为吸引顾客注意的“吆喝机”,而摄影技术更是如此,它传入中国后不久,就成为街头职业摄影师获利之利器,两者共同造就了中国的早期视听文化并将其产业化运营,为日后所形成的广播、电影乃至电视、互联网等视听文化体系奠定了历史基础。

在此基础上,我们再讨论视听文化如何推动中国现代文化产业的发展。早期视听文化在华形成的年代,正值晚清的最后30余年,早期市场经济与文化性消费在中国的开埠口岸已有所萌芽,此时的广州、上海、汉口、北京、南京等地已经出现了有消费能力、观念与意愿的新兴市民阶层,这是视听文化缘何能够顺势而为,推动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发生的重要原因。

视听技术本身有特殊性。它在欧美被发明时,是基于工业革命大时代迫切而又具体的需要(如通讯、测量与工程领域需要保留、传播图像与声音),但它传入中国时,中国并无工业革命的土壤,也无对视听技术的迫切需求,因此只有在文化消费领域另寻发展空间,遂很快形成了产业化的早期视听文化,并成为促进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发展的的重要技术要素。

现代文化产业的“现代性”因素依次递进有三重,一是技术的现代性,二是内容的现代性,三是生产关系的现代性^②。陈旭麓曾结合孙中山的“因袭”“规抚”和“创获”的观点,认为现代文化进入中国的总体路径是“阻力比较小”的科学技术先行,“外国的观念和方法”其次,最后再“吸收和改造(批判继承)的过程中,渐有自己的创获和发明”^③。无论是从文化产业理论来看,还是从中国近代文化的发展规律来说,“视听技术—早期视听文化—中国现代文化产业”的发展轨迹显然符合现代文化在华发展的总体路径。

其次,从发展过程与主体上来看,中国早期视听文化开启了“技术—文化”的转化范式,强化了技术之于文化的积极意义,为日后中国现代文化产业的发展吸收了更多的参与主体。

① KRÄTKE S. The Creative Capital of Cities: Interactive Knowledge Creation and the Urbanization Economies of Innovation. Oxford: Wiley-Blackwell, 2011: 16-17.

② POWER D, SCOTT A J. Cultural Industries and the Production of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2004: 60.

③ 陈旭麓. 中国近代史十五讲. 北京: 中华书局, 2016: 209.

在古代中国，以技术为生的“匠人”数千年里地位极低，长期与罪犯并列甚至一度直接由罪犯充任。汉代时“卒、徒、工匠以县官日作公事”^①，及至明代情况更为糟糕，“造作工艺，以囚人罚充”^②，这一歧视既造成了中国传统工匠地位的低下，也使得全社会并不重视技术的价值，更谈不上有什么“技术—文化”的转化。在中国传统观念里，“文化”是高高在上的经世之道，而“技术（艺）”是屈居末流的雕虫之术，科学技术在整个古代中国的知识体系里没有占主导地位^③，故而文化的发展向来不给匠人们留下施展才华的空间^④。在漫长的古代中国，传统文化主要依赖历史悠久的传统印刷术与造纸术传播，在技术革新层面极其缓慢，几乎没有“技术—文化”的转化。

但早期视听文化则凸显了技术对于文化的重要影响甚至决定性意义，假若没有摄影、录音技术，那么根本不可能会有早期视听文化。今日我们反观早期视听文化，或会觉得其表现形式简单粗陋，但对于长期依靠印刷术、造纸术传播文化的晚清中国人来说，早期视听技术所带来的冲击是颠覆性的，甚至使他们对于现代技术忽然产生了一种拜物教式的“技术崇拜”，因而早期视听文化得以凭借技术的被认可，走向产业化发展。咸丰十一年（1861年），诗人倪鸿在广州发现有外国人经营影楼，生意极好，“日获洋钱满一车”^⑤，留声机给在华商人们所带来的利润更不可小觑，虽然它甫一开始属于高端消费品，但是有一些店铺、餐厅购买之后，用于播放音乐，招徕客人，并博得部分达官显贵、大班买办们的青睐，因此留声机虽然昂贵，但在沪上并不愁销路，甚至“山寨货”开始出现，某些商家不得已在广告中注明：“仕商赐顾，认明仙孩、双龙、坐狗三牌为记”^⑥。

显而易见，早期视听文化从业者的地位比古代中国的“匠人”高许多，他们当中不少人不但身家巨富，甚至有了特殊的政治待遇。譬如晚清知名摄影师勋龄曾被慈禧聘为御用摄影师，并特别恩准他可以不必对慈禧下跪^⑦，当时许多高级官员实际上都无法享受到这一恩赏，这更是中国历史上“匠人”想都不敢想的殊荣。因此，无论是经济收入还是社会地位，都成了吸引当时许多新式知识分子或手艺人投身于中国现代文化产业的动机，而这在无形中为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吸收了更多的参与主体。

最后，从对象上来看，早期视听文化激发了民众们的参与热情，改变了民众对于文化的认识，为日后的中国现代文化产业打开了市场空间、培育了消费者群体。

文化产业的核心是文化，但古代中国人对于文化的热情并不在于将其认同为消费品，而是作为求得功名的途径。文化在中国传统观念中的主体精神是“苦”^⑧，“十年寒窗苦”、“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等，即使戏曲演出这种具备消费特征的文化活动，也弘扬“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的“苦文化”。长期以来民众对文化趣味的认识相当有限，“苦文化”难以孕育出休闲消费性的文化产业。

在早期视听文化出现之前，中国现代文化产业的主要受众是在华外侨或归国华侨^⑨。至于面对中国受众的文化产业，则仍以传统的戏曲演出为主，只是在经营管理方式上吸纳了西方的经纪人与票房制度^⑩。但早期视听文化则不然，它运用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声、光、电技术，从形式上颠覆了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存在、传播与消费方式。

譬如，留像于世在中国古代是一种极其高贵、庄重的家族宗法礼仪，一般来说只有一个家族的家长在特定历史时刻（譬如祝寿或被封官时）才有资格享有，并且要支付给画师一笔不菲的酬劳。因此，这

① 桓宽. 盐铁论. 北京：中华书局，1991：180.

② 申行时重修. 大明会典：卷 188. 工部：8. 第 5 册. 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刊刻社，1989：2563.

③ 韩晗，张隆溪. 从古代中国与世界关系看马可·波罗来华. 书屋，2017，（6）.

④ 这一点在中国古代印刷业中尤其明显，当时印书完全依赖刻工雕版印刷，但刻工的名字原则上是不能够出现在书里的，但只有一种例外：就是明清两代的重要官刻本。刻工的名字在当时会被允许出现在书页的夹层当中，但这并不是为了尊重刻工的劳动，而是因为明清两朝执行苛刻的言论管制政策，为了防止一旦出现印刷失误（包括有意宣扬官方不允许的言论），监管机构很方便追究到刻工的责任。

⑤ 倪鸿. 观西人以镜取影歌//清代诗文集汇编.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80.

⑥ 申报，1904-01-12.

⑦ 秦瘦鸥. 清宫最早的摄影家——勋龄. 紫禁城，1982，（4）.

⑧ 单正平. 晚清民族主义与文学转型.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3.

⑨ 韩晗. 在华外侨与中国现代文化产业的发生.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7，（4）.

⑩ 韩晗. 从“京班戏园”与“吉庆公所”看中国现代舞台文化产业的发生. 戏剧（中央戏剧学院学报），2017，（2）.

曾是古代中国人一种较大的荣誉^①。但自照相技术引入中国之后,迅速形成了摄影产业,上自太后公卿,下至贩夫走卒,只要愿意拿出几块钱,任何人都可以享受留像于世的待遇。与之类似的还有京剧演出。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之前,京剧虽然被称为“花部”,但它仍非人人时时可以消费的文化产品,一般只有达官显贵举办“堂会”时观众才可以一睹生旦净末丑的风采,即使出现了“京班戏园”这样的京剧产业化演出场所,但名角演出的票价仍非普通阶层可以承受。移植入华的录音技术却打破了这一局面——最先灌制唱片的恰是京剧名角,这使得他们的演出不再变得稀罕且不可复制,并且借助新兴技术迅速走向更为广阔的大众市场。综上所述,早期视听文化将原本居于庙堂之上的文化世俗化、大众化,将之前属于有钱、有闲阶层专享的文化平民化,这大大激发了民众对于文化产业的参与热情并改变了他们对文化的认识,从而催生出了现代大众文化。

法兰克福学派曾以“文化产业的基础是大众文化,而大众文化的框架是现代科学技术”^②这一论断批判文化产业对“纯艺术”的戕害,但这也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文化产业得以发展的前提:必须要以由现代科学技术推动而形成的大众文化为基础。这一点在早期视听文化的产业化进程中表现得尤其明显:曾经只属于精英、庙堂的文化,借助晚清视听技术的在华传播与推动走向了民间,形成了早期视听文化,并且成为市场上任何人可以消费的文化产品。因此,早期视听文化通过对大众文化的建构,为日后中国的现代文化产业打开了市场空间、培育了消费者群体。

三、结 语

不言而喻,早期视听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关系密切,而且为中国现代文化产业的形成、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历史基础,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化产业的重要起源。下面拟从早期视听文化的两方面特征入手,阐述它作为中国现代文化产业重要起源的启示与意义,以作为本文之结论。

一方面,早期视听文化是较早萌芽出现但技术性最强的中国现代文化门类之一,它一经出现,就在产业化的层面上迅速获得了较大进展,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化产业的发展进程,并证明了文化科技融合在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发展中的示范意义。

早期视听文化的形成依赖于视听技术的在华传播,而视听技术则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产物,是人类的电学、光学与声学理论及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的结晶,在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的若干起源中,早期视听文化可谓是“文化科技融合”的示范者。

“文化科技融合”是当下学界、业界就文化产业发展内涵上所形成的共识,也被认为是文化产业体系的重要内核。但文化科技融合在中国之滥觞,当推早期视听文化。因为文化与科技分别构成了中国早期视听文化的两翼,使其既具备文化属性,亦具备科技属性,是“文化科技融合”在现代中国最好的反映。

从文化科技融合这个角度来看,早期视听文化作为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的重要起源是名副其实的,它让普罗大众特别是文化活动的参与者认识到了现代科学技术之于文化的重要意义,颠覆了中国人长期以来形成的传统文化观念,使更多的人能够通过现代科学技术的直观展现从而认识、接触到文化产业,促进了中国现代文化产业乃至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因此,早期视听文化的产业化有力地证明了文化、科技与资本三者在全球化时代下不可分割、相互融合的密切关系。

另一方面,中国早期视听文化与世界同步,不但在出现时间上处于全世界的领先地位,而且在引进世界先进视听技术的同时,也引进了世界先进的视听艺术内容与文化产业经营方式。在中国现代文化产业诸门类中,早期视听文化是较早率先产业化的,因此发展现代文化产业,则势必要重视视听文化的作用与地位。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之前,中国尚未被卷入全球化时代,虽然当时已经有了来华传教士们的传教

①余新忠. 中国家庭史:第4卷.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24.

②WIGGERSHAUS R. The Frankfurt School: Its History, Theories, and Political Significanc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1995: 45-46.

活动与广州的“十三行”对外贸易，但当时西方的科学技术、意识形态仍未对中国产生大的影响。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强行、被动地卷入全球化浪潮当中，彼时中国属于全世界的生产市场，只有义务而无权利，被称为“半殖民、半封建”社会。尽管如此，西方科学技术与生产方式仍通过资本、人口与信息的流动来到中国——这实际上与世界其他被殖民的地区是同步的。正如前文所述，摄影、录音技术在传入中国的同时，也传入到埃及、交趾、支那（今老挝、柬埔寨、越南）与南美等其他被殖民地区，但因中国人口众多、租界繁盛，与其他被殖民地区相比，视听技术在中国发展也最快，所形成的视听文化规模也最大。

中国早期视听文化不但起步早，而且后劲足。电影技术进入中国之后，视听文化的发展更是一日千里，及至 1930 年代，在以洪深为代表的电影先驱者的推动下，好莱坞电影曾同步传入中国，不但在上海、广州等地拥有较高的票房，而且从内容到形式都对中国电影产业产生了深远影响；除此之外，当时中国民营商业广播电台的发展速度也在亚洲领先，上海一地所拥有的民营电台数量并不逊色于同时代的纽约、伦敦，其种类、内容与放送技术亦居于世界前列^①。及至今日，中国的视听文化及其产业仍在世界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恰拜中国早期视听文化所打下的基础所赐。

今日中国的文化产业，尽管门类齐全、体系完备，但视听文化仍占据重要的份额。以高速互联网技术、虚拟现实技术、个人通讯终端技术与人工智能技术等等为代表的先进技术赋予了视听文化新的内涵，它对于现代科学技术的依赖反映了文化产业的基本特质。要发展文化产业，必然要重视视听文化的地位与作用。当今视听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

一言以蔽之，因为视听技术的传入，使得萌芽于晚清的早期视听文化与世界同步发展。更关键在于，早期视听文化深刻地反映了文化科技融合之于中国现代文化产业不可或缺的意义。因此，作为中国现代文化产业的重要起源的早期视听文化，不但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而且还赋予了当下更多的启示。

Early Audiovisual Culture:

The Important Origin of Chinese Modern Cultural Industries

HAN Han (Shenzhen University)

Abstract: When audiovisual technology which was composed of photography technology and recording technology was introduced into China during Late-Qing Dynasty, and formed Chinese early audiovisual culture. Early audiovisual culture not only built a bridge for modern audiovisual technology and Chinese modern cultural industries, but also opened the shift paradigm of “technology-culture”, which strengthened the effect of technology for culture and promoted economic and social position of technicians, so as to absorb more participators for Chinese modern cultural Industries development. Historically, early audiovisual culture proved that cultural and technological integration has demonstrative significance, and made it become a history of cultural and technological integration to certain extend, and early audiovisual culture is firstly to successfully achieve industrialization in different categories of Chinese modern cultural industries. The function and status of audiovisual culture should be valued for developing modern cultural industries.

Key words: audiovisual technologies; early audiovisual culture; Chinese modern cultural industries; Late-Qing Dynasty

● 收稿日期：2017-03-29

● 作者地址：韩 晗，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广东 深圳 518060。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11&·ZD023)

● 责任编辑：何坤翁

^①韩晗. 中国早期电台的“民营热”.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 (4).